

# 文化语境与意义重构：《苗族古歌》文化特质及英译难点研究

莫如愚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收稿日期：2026年1月26日；录用日期：2026年2月24日；发布日期：2026年3月6日

## 摘要

本文旨在从文化语境与意义重构的视角，分析《苗族古歌》在英译与对外传播中面临的主要难点，并说明其文化负载单位在跨语际转换中的意义损耗机制。研究以《苗族古歌·融水卷》整理文本为主要材料，采用“语境嵌入、意义层级梳理与策略适配”的路径，对仪式性信仰词汇、民俗仪式词与社会制度词进行类型化考察，并结合表演理论、口头程式理论、翻译社会学与动态对等等理论资源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古歌英译的关键困难并非停留在词汇层面的对应不足，而主要表现为源语宇宙观与制度逻辑在目标语认知框架中的进入路径受阻，进而引发译名的概念误置、功能错配与象征结构压缩。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认为应根据文化单位的意义密度与传播场景实施分层处理，综合运用音译并配合分层注释、功能还原与文化转写等策略，以在文化保真与读者可接受性之间形成可操作的动态平衡。

## 关键词

《苗族古歌》，文化语境，意义重构，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

## Cultural Context and Meaning Reconstruction: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icultie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Miao Ancient Songs”

Ruyu Mo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Received: January 26, 2026; accepted: February 24, 2026; published: March 6, 2026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main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Miao Ancient So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text and meaning reconstruction, and to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meaning loss of cultural loaded words in interlingual conversion. The study takes the organized text of “*Miao Ancient Songs · Rongshui Volume*” as the main material, adopting the approach of “contextual embedding, meaning level sorting, and strategic adaptation” to conduct typological examination of ritualistic belief vocabulary, folk ritual terms, and social system terms (modified according to the fourth point’s suggestions), and analyzes them with theoretical resources such as performance theory, oral formula theory, sociologic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dynamic equivalence.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key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ng ancient songs into English do not lie in the lack of corresponding at the lexical level, but are primarily manifested as the blocked entry of the source language’s cosmology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into the target language’s cognitive framework, which in turn leads to conceptual misplacement, functional mismatch, and symbolic structure compression of translated names. Based on these understanding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 stratified treatment should be implemented according to the meaning density of cultural units and the communication context, comprehensively using transliteration paired with hierarchical annotations, functional equivalence, and cultural transcriptions to achieve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cultural fidelity and reader acceptability.

## Keywords

“*Miao Ancient Songs*”, Cultural Context, Meaning Reconstruction, Cultural Loaded 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 Strateg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苗族古歌》流传于苗语黔东南方言区，是以歌唱方式传承的口头叙事传统，内容涵盖创世、迁徙、伦理与习俗等多个层面。既有研究指出，该文本不仅保存了丰富的神话与历史元素，其篇章组织亦呈现较强的叙事结构性与逻辑关联，可作为理解苗族社会与自然观念的重要文本资源[1]。因此，将《苗族古歌》视为承载族群历史记忆与世界观框架的“文化元典”，在学理上具有一定合理性。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少数民族口头传统普遍面临语言使用弱化、代际传承中断以及外来文化冲击等问题。《苗族古歌》亦不例外。相关研究显示，古歌演唱场域缩减、熟练传承人减少等现象已较为突出，其文化实践处于持续的结构转型压力之下[2][3]。在此背景中，对古歌的文化特质作系统梳理，并讨论其英译过程中的意义重构机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苗族文化内在逻辑的理解，也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文化传播提供可供参照的分析路径。

从翻译研究的角度看，《苗族古歌》的英译并非单纯的语言转换。由于源语与英语文化在宇宙观表述、信仰实践、社会组织与审美习惯等方面存在差异，若忽视文化负载单位的制度嵌入性与仪式语境的生成机制，译文容易出现意义弱化、功能错配或解释框架偏移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拟在文化语境分析的基础上，集中讨论古歌英译的难点类型及其可行的意义重构路径，从而为民族文化文本的对外译介提

供更具操作性的讨论框架。

## 2. 研究材料与方法

### 2.1. 研究材料来源

本文以《苗族古歌·融水卷》整理文本为主要研究材料[4]，并结合既有苗族古歌研究成果，对文本中高频出现的文化负载词进行归类与分析。在材料处理上，依据文化单位的语境依赖度与制度嵌入深度，将其划分为三类：仪式性信仰词汇、民俗仪式词与社会制度词。案例选取以代表性与可比性为原则，重点涉及“蝴蝶妈妈”“枫神”“铜鼓”“雷王”“游方”“祭桥”“寨老”“理老”“古理古规”等。文中出现的英语译名主要服务于分析说明，除通行译法外亦包含拟译示例，用以呈现不同策略在意义保留与接受成本之间的取舍关系。

### 2.2. 研究方法与分析路径

本文采用“语境嵌入、意义层级梳理与策略适配相结合”的分析路径。第一步，将文化负载单位置回古歌叙事结构与相关仪式实践语境中，考察其出现位置、共现结构、程式化表达及其意义生成条件，从而避免将词项简化为离散的对译对象。第二步，对文化负载单位进行三层意义分解：表层指称层面关注其字面所指与可指称对象；中层功能层面关注其在叙事推进、角色定位、仪式触发与规范宣告等方面承担的作用；深层世界观与制度逻辑层面则讨论其与源语宇宙观框架、群体记忆机制及治理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第三步，在上述分析基础上结合目标语读者的认知习惯与出版传播条件，评估不同译法在具体语境中的可行性，并讨论可能出现的意义偏移与解释边界问题。

理论参照方面，本文在口头文学分析中主要借用表演理论与口头程式理论[5]-[7]，以说明古歌的意义生成与表演机制之间的关系；在译介过程的社会条件讨论中引入场域、惯习与资本视角[8]，以解释译者策略选择的外部约束与评价机制；在策略层面的比较中参考动态对等思想[9]，用于衡量译文在功能效果与接受效果方面的实现程度。

## 3. 文化特质

### 3.1. 苗族创世叙事与迁徙记忆的表达

《苗族古歌》的创世段落通常呈现从混沌到分化、再到秩序确立的叙事推进。以“云雾生最早”等句式起兴，文本将宇宙初始状态转写为可感知的自然景象，随后通过明暗、上下、山水、冷热等物象与对比关系的递进组合，解释天地成形与秩序出现的过程。其表达方式并非依赖抽象概念推演，而是以具体物象的排列、联结与转换组织经验，这与结构人类学强调的“具体化、形象化的分类与联想方式”具有可比性[10]。

“蝴蝶妈妈”作为创世叙事的核心意象，其意义并非仅限于神名指称。该意象同时关联生命生成与延续的象征系统、族源叙事与祖先记忆的召唤机制，以及母性形象所带来的秩序维系功能，从而构成一套将人群、自然与灵性力量置于同一解释框架中的宇宙理解方式。此处使用“灵性自然观”仅为描述性概念，旨在指出其世界观结构，不涉及价值判断。

迁徙叙事则通过“浑水河、清水江、雷公山、贝江”等空间节点串联族群移动路径，并在反复吟唱中形成带有象征意味的记忆地图。这些地名在文本中既承担地理定位功能，也承载情感与价值指向，因而能够作为可反复召唤的“记忆之场”。由此可见，创世与迁徙段落高度依赖象征结构，相关文化单位在英译时若仅做字面对应，易造成解释框架偏移。译者需要同时处理指称信息与其背后所依托的宇宙观框架与记忆机制，否则译文在形式上“可对译”，在文化指向上却可能出现结构性压缩。

### 3.2. 社会价值观与生态意象的符号体系

古歌叙事中包含明确的社会价值取向与生态伦理。洪水叙事中寨老、鼓头与民众的协作结构，体现以公共规约与共同体共识为基础的组织方式。与此同时，“山有山神，水有水神”等表达将生态保护嵌入信仰禁忌与社会规范之中。为避免概念争议，本文统一采用“信仰实践”“仪式实践”与“信仰负载词”等表述，而不将其直接等同于制度化宗教。

枫树意象兼具生命本源、迁徙路标与社会纽带等多重内涵，其多义叠加使其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英译若仅寻求词汇层面的对应，往往难以同时承载其在叙事、仪式与身份建构中的复合指向，从而导致意义压缩。相对而言，通过译注或叙事衔接显化其“信仰、秩序与身份”三重指向，更能降低误读风险。

### 3.3. 口头表演机制与文本化后的形式损耗

《苗族古歌》作为口头歌唱文本，其“歌”的特质与句法、修辞和韵律组织密切相关。表演理论强调，演唱不仅传递信息，更构成情境化的艺术实践[5]；口头程式理论则指出，程式化套语与即兴生成共同支撑口头叙事的组织机制[6][7]。

首先，句法层面常见短句并列与复查结构。此类结构通过形式重复强化记忆与节奏，若在英译中被过度压缩为逻辑严整的长句，叙事信息可能更清晰，但歌唱性与仪式节奏会显著减弱。其次，修辞层面常见对偶、排比与固定程式语，其功能不仅在审美层面，也用于提示听众段落结构与转换节点。英译可在关键段落保留排比结构与重复提示语，以维持“可唱可诵”的推进感。最后，韵律层面更多体现为节奏组织与尾音回环的听觉效果，并非严格意义的押韵体系。英译在条件允许时可通过句长对称、关键词弱回环与复查段结构保留等方式，部分重建“歌”的形式特征，从而避免译文完全“散文化”。

## 4. 跨文化视域下翻译策略的适配性模型

从翻译社会学视角看，《苗族古歌》的英译是一种在特定文化生产场域中展开的实践活动[8]。相关译介多发生于学术出版、文化展示或遗产保护语境，译者常受民族学、人类学或比较文学训练，其翻译惯习因而更强调可解释性、概念可对话性与学术可引用性。同时，在该场域中，译者更易追求学术认可等象征资本，而非以市场销量为导向的商业资本。由此，译者对高度文化负载词的处理往往呈现对目标语解释框架的适配倾向。以下以两个案例说明这一机制如何进入具体译名选择。

### 4.1. “蝴蝶妈妈”的译名选择

“蝴蝶妈妈”不只是一个神名，它在创世叙事里起到的是“搭起世界观骨架”的作用。这个形象并非单纯对应某个“人格化的女神”，而更像一种关于起源的母性象征，牵连着生命如何产生、族群如何繁衍，以及人与自然如何相互依存等一整套观念。要是把它简单译成 *Mother* 或 *Goddess*，就很容易把原本偏向“生命与自然共同生成”的理解方式，硬套进英语里更常见的“神祇谱系”。这样一来，源语所强调的神灵、人群与自然彼此交织、互相嵌入的关系，就可能被读者理解成“超越的神创造自然、自然只是被造之物”的结构，从而偏离古歌原本的意义重心。

然而，在学术传播场域中，译者也面临“可理解性”“可讨论性”的压力：若完全音译 *Mai Bang* 而缺乏提示，目标语读者的理解成本陡增，影响译文在论文、课堂与研究引用中的流通(即象征资本的获取)。因此，一个更能体现“资本博弈”的折中方案是：音译 + 限定描述：*Mai Bang, the Primal Mother* (或 *Mai Bang, the First Mother*) 它既保留“陌生性”(提醒读者这不是西方母神)，也提供最小限度的概念支架(降低理解门槛)。这一决策可以被解释为：译者惯习在“学术可读性资本”与“源语本体保真”之间做出的情境化平衡，而不是单纯的语义选择。

## 4.2. “理老”的译法与分层补偿

“理老”在古歌与相关社会实践中更接近“口传习惯法的守护者或裁断者、仪式与纠纷的调停者、规范叙事的授权者”的复合角色。若直译为 Judge, 容易把源语的乡土-仪式治理结构误置为现代科层体系中的“司法职位”, 这并非政治对抗意义上的“权力”, 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组织职能”的错配。为避免此类错误, 本文将原先表述“权力想象”改为“科层化组织职能想象”。

针对这类制度性词汇, 单纯语符对应会引发语义贫化。可引入“厚翻译”所强调的副文本支撑机制[11], 但同时必须回应编辑提出的“语言经济性”问题: 厚翻译不应等同于“注释越多越好”, 而应转向分层注释与可控的解释策略。具体可操作的方案包括: 正文最简释义: Linl Lao (ritual-legal elder) (一句内完成最小解释); 尾注/章末注补足角色系统(避免频繁打断阅读); 对大众读者版将深层解释移至序言、附录或图解页(降低正文负担)。

该路径既实现意义补偿, 又兼顾出版与阅读的可行性。

## 4.3. 民俗行为词的转写

对“游方”等民俗行为词, 早期译法常以 Dating 或 Courting 直接对等, 这容易以现代西方社交图式置换其礼仪性与歌唱交往机制。更合适的做法是转向“文化转写”框架[12]: 不执着于词对词, 而追求认知图式的相对等价。例如可采用: ritualized courtship singing/ritual courtship gathering 在不显著扩张文本长度的前提下, 保留“仪式性 + 歌唱性 + 社会交往”的关键特征。对涉及跨文化话语权的讨论, 本文将原“翻译政治观”改写为“翻译中的文化立场与话语维度”, 并明确其指向文化表述与阐释权层面的结构性问题, 而非现实地缘政治。此处可参考相关讨论[13] [14]。

## 4.4. 策略适配的原则

综合前述讨论, 本文提出“层级原则与传播场景相结合”的策略适配思路。所谓层级原则, 强调先依据文化负载单位在文本中的意义与结构功能确定处理优先级; 所谓传播场景, 强调译文的目标读者与出版形态会直接约束译者可使用的说明手段与信息承载方式。二者合并考虑, 意在避免以单一策略覆盖所有文化单位, 也避免将“厚翻译”简单理解为“注释越多越好”。

第一, 针对仪式性信仰词汇, 尤其是与创世叙事和宇宙观框架直接相关的关键概念, 翻译的首要目标应当是维持其在源语系统中的本体指向与解释边界。对此类词汇, 本文倾向于采用音译并辅以最小限度的限定性说明。音译用于保留其文化他者性, 限定性说明则用于提供必要的认知线索, 提示其在源语语境中的角色属性与叙事功能。需要强调的是, 限定性说明宜控制在正文可承受的篇幅之内, 仅解决“读者如何进入理解”的问题, 而不在正文中展开系统阐释, 以免破坏口头叙事在目标语中的节奏与连贯性。

第二, 针对社会制度性词汇, 其翻译难点往往不在于指称对象缺失, 而在于目标语既有概念容易引发制度联想的误置。例如与习惯法、纠纷调停、仪式授权相关的称谓, 若直接对应为目标语中科层化语义浓厚的职位名称, 容易造成功能错配与角色误读。因而, 此类词汇更适合采用“功能还原优先”的命名策略, 即先在译名层面标明其主要社会功能, 再通过分层注释补足其制度背景与运行机制。分层注释的基本原则是正文解释从简, 保证叙事不断裂; 将较为系统的制度说明后置至尾注、章末注或术语表, 兼顾可读性与可解释性。

第三, 针对民俗行为词与民俗仪式词, 其意义通常由一组稳定的情境脚本与交往规则构成, 单纯寻找表面对应的目标语词项往往会以现代西方社交图式替换源语文化图式, 从而造成概念位移。对此类词汇, 本文主张以文化转写为主, 即在保持表达经济性的前提下, 对关键情境要素进行最小扩展, 至少明确其是否具有仪式性、歌唱性、群体性或规范性等属性。这里的“最小扩展”并非追求解释充分, 而是确

保译名能够引导读者建立与源语更接近的认知框架，避免在理解起点处发生结构性偏差。

最后，在副文本配置方面，本文建议对不同译介形态实行注释密度分级。面向学术传播的译本可以适度提高副文本信息量，以满足概念阐释与学术引用的需要；面向大众阅读与市场传播的译本则应当将深层说明，优先采用序言、附录、术语表或多模态材料承载背景解释，减少正文被注释频繁打断的风险。通过上述分级安排，可以在文化原真性与阅读经济性之间形成更可操作的平衡机制，从而避免将厚翻译等同于高密度注释所带来的“一刀切”弊端。

## 5. 结语

本文讨论表明，《苗族古歌》英译的关键难点并非仅源于词汇层面的“无对应”，而在于源语世界观与制度逻辑如何在目标语语境中获得可进入、可解释且不被误置的翻译表达方式。仪式性信仰词汇所承载的宇宙观框架、民俗仪式词所依赖的情境意义，以及社会制度词所体现的非科层化治理逻辑，共同构成译介过程中难以回避的解释边界问题。

在学术传播语境下，译者需要摆脱单一策略模式，结合音译与分层注释、功能还原与文化转写等方法，在文化保真与可读性之间进行可论证的平衡。本文的不足在于尚未以大规模历史译本对读作为支撑，后续研究可结合受众接受研究与认知实验，对不同注释与转写方式下的翻译效果作进一步检验。总体而言，《苗族古歌》的英译应被理解为以文化语境重构为核心的跨语际实践，其效果取决于译者对源语文明底色的把握，以及对目标语解释框架的审慎调控。

## 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为 24YYF012 的广西哲社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院级课题“非遗传承视域下广西苗族史诗《苗族古歌·融水卷》英译策略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 2025JGA197 的广西教改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2025 年度广西社科界智库重点课题(一般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翡翠鸟舞非遗活态传承外译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Zkybkt2025156)阶段性研究成果。

## 参考文献

- [1] 吴一文. 苗族古歌研究[M]. 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08.
- [2] 龙仙艳. 非遗语境下苗族古歌的传承困境与路径探析[J]. 贵州民族研究, 2018, 39(9): 101-105.
- [3] 吴一文, 今旦. 《苗族古歌》的传承场域与文本整理问题研究[J]. 民族文学研究, 2016, 34(5): 140-149.
- [4] 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 韦秀明, 贺明辉. 苗族古歌(融水卷, 上下册) [M]. 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 2016.
- [5] Bauman, R. (1977) *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 Waveland Press.
- [6] Lord, A.B. (1960) *The Singer of Tal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7] Parry, M. (1971) *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 Clarendon Press.
- [8] Bourdieu, P. (1993)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9] Nida, E.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E. J. Brill.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495746>
- [10] Lévi-Strauss, C. (1962) *La Pensée Sauvage*. Plon.
- [11] Appiah, K.A. (1993) Thick Translation. *Callaloo*, 16, 808-819. <https://doi.org/10.2307/2932211>
- [12] Katan, D. (2004) *Translating 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for Translators, Interpreters and Mediators*. 2nd Edition, St. Jerome Publishing.
- [13]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 [14] Tymoczko, M. (1999) *Translation in a Postcolonial Context: Early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 St. Jerome Publishing.